

安康稠酒 一个城市的慢生活

通讯员 邹瑶

酒，是人类生活重要饮品之一，始于杜康而发扬于后人。史前酿酒，夏商酿黄酒，宋代发明蒸馏酒，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主饮的酒类。

稠酒是安康当地农家酿造的一种糯米酒，属于酿制酒的传统工艺。稠酒以五里为最佳，相传大禹治水在五里月河一带，用竹筒装当地人送来的米饭，离开后遗失的竹筒被当地人发现，发出阵阵香味，竹筒内剩下的酒糟，黄黄的米粒，下面沉淀着一层黄色稠稠的汁，便给这酒取名叫“稠酒”，后学习制作“稠酒”，延续至今。

如今的安康城，三五好友相聚的场所选择很多，“家居酒店农家乐、火锅烧烤麻辣烫”，随时能前往把酒言欢。而在以前，稠酒铺子是人们下班后或好友小聚或个人独饮的不二选择。

传统的稠酒铺子以酒为主，不带炒菜，下酒菜即为经典四件套“油炸花生、豆腐干、糖醋蒜、炒蚕蛹”，也有凉拌黄瓜替代糖醋蒜。有酒客会自己装一口袋炒花生，到了酒铺子抓出花生放

桌上，喊店家“来一碗酒”，悠哉地坐下，慢慢地剥着花生抿一口稠酒，听着众人闲聊，合适了搭上一句嘴。坐在一起喝边聊，时间长了，生人也变为熟人、成为酒友。

喝完一碗再要时便喊到“再来一碗”。遇到熟人朋友来，先到的会豪爽地给店家说“给他来一碗”，店家默契地就会把账记在请客的头上。

安康城里的稠酒铺子，基本都是20世纪80年代从五里街上搬来做稠酒营生的，年代久远一些的新城街道的“世存稠酒”和城门口洞子的“五里稠酒”。

李娣林生于1952年，是五里镇李湾村四组村民。李娣林自幼跟随父亲李文从事五里稠酒酿造，从1972年开始在李湾村、五里镇老街、汉滨区兴安西路、汉滨区新城路等地从事五里稠酒生产、销售至今。

五里镇李湾村李娣林家四代人不断传承研发稠酒，在当地非常有名。1986年，李娣林到安康中心城区酿造销售稠酒，因酿造的稠酒品

质好，色泽乳白，甜如蜜、香如桂，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认可，因李娣林本人来自汉滨区五里镇，加之他讲的五里镇口音，大家简称李娣林酿造的稠酒为“五里稠酒”。算起来从李娣林爷爷，出生于1841年的李贵林酿造稠酒开始，传到李娣林儿子翁紫康这一辈已是四代百年老字号了。

用了几十年的小方桌、瓮罐子都保留着当年的样貌；从十几岁喝到几十岁，连同坐的位置都没有变。李娣林从父辈手中接过稠酒这个传统技艺，凭着自己对稠酒的热爱，保存着酒客熟悉的环境。熟悉的酒客，相继来到酒铺子，随意落座，淡淡抿酒，在酒铺子里，感觉忘记了门外这个日新月异、纷繁嘈杂的社会。

稠酒的制作工艺基本分为泡酒米、蒸酒米、一次发酵、二次发酵、三次发酵五个步骤，看似简单，但其中考验的是多年积累且言传身教也不一定完全掌握的经验。泡酒米冬夏时长不同，夏季温度高12小时左右即可，冬季温度低

则需多泡数小时。泡好的酒米放入蒸屉，高温蒸制一小时后，冷水快速降温冷却，然后加酒曲、酵母搅拌均匀置于盆中进行一次发酵，其发酵时长也需根据季节、温度、湿度不同有所区别。待盆中的酒米开始转化出糖变成半干半汤的状态时，则开始转入瓦缸中进行二次发酵，在这个环节，糖分进一步被激发，随着二次发酵的糖分含量达到峰值，进而向酒精转化。在进行三次发酵时，需加入酒浆对稠酒的口感、浓度、酒精度做最后环节的确定。再放置数天后，稠酒便制作完成，静待酒客上门。

在传承稠酒制作技艺的同时，自幼跟随父母学习酿造技术的80后翁紫康、翁紫安两兄弟更有着品牌意识和将传统技艺发扬光大的想法。2016年成立“安康市新城稠酒有限公司”，2021年获得“安康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习所”，2022年注册“五里稠酒”商标。在新时代一系列顺应市场发展的操作让

稠酒这项传统技艺逐步发生了蜕变，从满足本土消费发展到覆盖省内外。

在媒体不发达、网络未出现的年代，酒铺子和茶馆就是一个城市的信息集结地和发散地，想听到什么新闻和趣事，唯有在这些场所能够获得。那个年代，不论身份贵贱，都能进这样的酒铺子消费，钱多的有酒有菜，钱少的喝点干酒，人多的时候拼个桌，或者索性靠着门边儿、墙沿儿一蹲，喝酒的喝酒，聊天的聊天，神侃一通，嬉笑怒骂，间或还穿插着点儿小矛盾，但却并不影响邻里情谊，这便是烟火人生。

现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成了低头手机党，往日简单的乐趣和交流反而成了一种奢望。

酒铺子，以酒为载体，无论一人悠悠独饮还是众人谈笑小聚，都是让人心灵放松的一隅。慢慢饮、悠悠过，一个城市的慢生活在酒铺子里温馨地化开。



泡好的酒米放入蒸屉高温蒸制



用冷水进行快速冷却



放入瓦缸进行二次发酵



放置数天后稠酒便制作完成



五里稠酒获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两位基层干部的“篮球夜话”

新华社西安8月17日电(记者 郑昕)16日晚9点多，巴山小城陕西省岚皋县的碗场坝广场灯火辉煌，正在这里举行的2024巴山汉水和美丽乡村篮球大赛(“陕西村BA”)文旅挑战赛揭幕战激战正酣。首节战罢，带队出赛的贵州省台江县台盘村村委会主任岑江龙走出喧嚣的球场接电话，正撞见与赛场一河之隔的岚皋县城关镇肖家坝社区的党总支书记贾永建。

两位基层干部此前并不相识，却因为“村BA”的话题聊到了一起。“我2020年7月去贵州学习了一周时间，抽了一天来台盘村看‘村BA’比赛，当时赛场人山人海没能进去，但兴许和你有了一面之缘。”贾永建说着，身上白色T恤印着的岚皋“村BA”标识与岑江龙上衣的台江“村BA”标识相映成趣。

台江县的“村BA”虽说在近两三年才“出圈”成为全国话题，但在当地早已有了数十年的积累，成为老百姓的一大盛事，这也是贾永建一直心驰神往的。这几天来，贾永建在社区连开了三次会，部署配合挑战赛的文艺展演和商业活动。

作为岚皋全县餐饮商贸最为发达的“白菜心”，他很想知道如何在自己的辖区内复制台盘村的盛况。

“我昨天下午才到岚皋，一进县城就觉得这里和我们台江很像——都是四面环山，中间有一条河穿城而过。”岑江龙说，“今天晚上的气氛也很好，观众们格外热情，自创助威口号，感觉就像回到了我们村的赛场。”

“村BA”火爆，岑江龙就成了“空中飞人”。尤其是在2023年被推选为村委会主任后，兼任着台盘村篮球协会会长，成了当地“村BA”一定程度上的操盘手，把赛事和文旅商贸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在岚皋县停留不到30个小时，他在16日深夜就要返程出席周末在台江举行的文旅活动——这已成了他工作生活的常态。

“台盘村由‘村BA’带来的改变很大，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提升，老百姓靠着在赛场售卖土特产，在网上销售贴着‘村BA’官方标识的文创产品，收入节节提高，村上由体育消费带

动的集体经济也不断扩充。”岑江龙说，村民找到了乐子，发展找到了路子，乡村振兴也有了抓手。

作为后发地区，岚皋县去年也办起了“村BA”，但由于经验不足，影响力仅止于秦巴山区。今年，岚皋县决定将“村BA”作为牵引全县夏季群众活动的“火车头”，邀请台江县的赛事运营推广团队，在8月至10月间举办文旅挑战赛，并配合暑期、中国农民丰收节、国庆节等重要节点安排一系列“夜经济”活动。16日晚间的“头炮”打响，小山城里万人空巷，不仅碗场坝的赛场内外聚满了免费观赛的各地群众，就连城里不少在岚河两岸散步健身的群众，也不忘打开手机在各路直播平台观看赛况。“这次比赛能够吸引不少西安、重庆的观众过来，不仅因为球赛精彩，也因为我们的服务让外地游客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贾永建说，仅仅他们社区这次就派出143名志愿者，在赛场周边提供停车引导、住宿咨询、秩序维持等服务。

贾永建告诉岑江龙，肖家坝社区的气排球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近年来当地建成了专业气排球馆，并举办了全省比赛。“我们后面还要依托气排球运动更受老年人青睐的特点，在社区开发一些康养休闲旅游项目，并且和县上的特产经销商合作开发旅游产品。”贾永建说。

听到这里，岑江龙连连称是。随着台江“村BA”的影响力扩大，他也在考虑建立赛事联盟，将办赛模式和发展经验复制到全国更多乡村。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关于促进消费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到，鼓励创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赛事品牌，培育专业化运营团队，引导各地推出特色鲜明的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这更让岑江龙信心十足，“我们有成熟的经验和成型的团队，未来更加专业、更具带动力的‘村BA’一定可以在全国落地、开花、结果。”

“我们也等着那一天，岚皋在其中肯定是一个重要赛区。”贾永建对岑江龙说，“再过几年，等县上的高铁通了，一定会有更多人来全国感受我们小城的秀丽和老百姓的热情。到时候，我再邀请你来看比赛。”



贾永建(左)正在和岑江龙进行交流。

新华社记者 郑昕 摄

被区别对待的红绿灯

——城市交通文明的道德考量

田杰

在热浪翻滚的天气里，城市街道如同被烘烤过的熔炉，考验着每一位出行者的心性与耐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现象——骑摩托车或电动车的市民在非十字路口红绿灯前的闯红灯行为，却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城市交通文明的现状，以及市民道德素养的层次。

在城市的某些路段，尤其是在中间或关键部位，为了确保交通流畅和行人安全，设置了红绿灯。然而，当高温袭来，部分市民面对非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似乎选择了“权宜之计”，直接闯红灯，以避免在酷热中等待。这一行为，表面上看似是出于对自身健康的考量，实则触及了交通规则与个人道德的底线，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红绿灯，作为交通规则的象征，其存在的意义在于维护交通秩序，保障行人和车辆的安全。无论是在十字路口还是在非十字路口，其规则的权威性不应因地点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然而，一些市民在面对非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时选择性遵守，这种区别对待不仅反映了个人对规则的漠视，更暴露出在道德素养方面的欠缺。

在十字路口或重要路段，这些市民却能自觉停下等待红绿灯，这种行为的转变，或许源于对交通法规的畏惧，或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故后果的担忧。然而，这种仅在

特定环境下遵守规则的现象，恰恰说明了道德素养的培养与提升，不应仅仅依赖于外在的约束与惩罚，更应源于内心的自觉与认同。

城市交通文明的构建，离不开每一位市民的共同努力。在面对红绿灯时，无论是十字路口还是非十字路口，都应成为检验个人道德素养的试金石。遵守交通规则，不仅是一种法律义务，更是对他人安全负责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为了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城市交通环境，我们呼吁每一位市民从自我做起，无论天气如何炎热，无论地点如何偏僻，都应自觉遵守红绿灯规则，将交通规则内化为个人行为准则的一部分。同时，城市管理者也应加大对交通规则的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交通安全意识，通过教育引导和合理规划，共同促进城市交通文明的提升。

让我们共同守护城市交通的文明与安全，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一次文明的展示，让红绿灯下的选择，成为衡量个人道德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只有当每一位市民都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我们的城市才能真正成为文明、和谐的家园。

让我们携手努力，让遵守红绿灯规则成为一种习惯，让道德素养成为我们城市交通文明最亮丽的风景线。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四)

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到达西安，中共西北特支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关系交给中共中央代表和红军代表团。为阻南京方面的部队西进潼关，中共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迅速开往潼关以东参加破坏铁路。

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接到命令后，立即停止攻打汉阴县城的计划，全军1000余人在军长何振亚率领下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从汉阴县双庙子挥师北上，日夜兼程，翻过秦岭，到达长安县子午镇。因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上级命令这支部队归红十五军团领导，并于1937年2月9日抵达礼泉县叱干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3月初，在甘肃庆阳驛马关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8月，红十五军团警卫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何振亚任营长，与全师一起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8月底，警卫营从韩城县芝川镇渡过黄河，到山西省荣和，从侯马乘同蒲铁路的火车北上，在崞县原坪镇下车，于沙河镇首战日本侵略军，随后翻越五台山，穿过长城，参加平型关战斗，全师取得消灭日军坂垣师团1000余人的伟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后，警卫营随同一一五师主力活动于晋东北，袭击张家口至广灵、代县的交通线，并向日军侧翼出击。在代县中解口，警卫营第一次与日军硬碰硬的独立作战。战斗中，警卫营的战士虽然伤亡很大，但表现得非常英勇。营长何振亚、政委李雪三的警卫员均负重伤倒下，何、李仍指挥全营猛烈出击。汉阴籍战士刘华林被敌打掉了下巴骨仍顽强战斗，直至取得消灭日军50多人的胜利，缴获日军一部分武器。这

次战斗，受到团部表扬，证明由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组成的警卫营有很强的战斗力。

1938年4月初，日军调集3万余人，分9路向晋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围歼刚到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主力，解除对它的后方的威胁。第二营随同三四四旅，参加了反围攻作战。战后，二营受到三四四旅首长的表扬。由于我八路军的不断追击。到4月下旬打破了日军的9路围攻。先后歼敌40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夏天，日军再次向我根据地大举进犯。7月6日，在山西阳城的町店，二营与日军再次恶战。日军调100多辆汽车和山炮，妄图以优势武器将我军消灭。战斗中，二营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毙伤俘敌100多人，击毁汽车20辆，此战二营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如第4连123人，战后只剩下13人。

经过几次与日军的残酷战斗，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指战员，绝大部分血洒山西抗日疆场。1000余人的部队，调离该部和剩者不足300人，700多人为国捐躯，这支由陕南人民的子弟组成的英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不畏强敌，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热忱，为陕南人民争了光。

皖南事变后，三四四旅六八七团编入新四军第三师二十九团。从此，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这支部队在苏皖地区坚持抗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战胜利后，这支部队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成为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一一七师重要组成部分。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何振亚、沈启贤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杜瑜华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东渡黄河 抗日前线杀敌人